

疑古与开新

胡适文选

俞吾金 编选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

疑古与开新

——胡适文选

俞吾金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

疑古与开新

——胡适文选

俞吾金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25 字数 525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80613-023-3/B·30 定价:25.00 元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总序

我们正遭逢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从“中央之国”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伴随着社会巨变的是思想巨变。思想之变是从“浅层次”开始的，即对“先务之急”作应变的探讨。“先务之急”是西方军事力量进犯难以抵挡，于是第一位的应变思想是“师夷之长技”。造船造炮不能解决问题，人们接受了“须从社会变革入手”的思路，于是兴起思想巨变之大潮，至今未衰。我们仍在这场社会巨变之中。人们曾经以为，1949年如果说不上是世界历史新纪元之开端，至少也基本结束了中华民族社会结构之巨变。然而近二十多年的经历，特别其中两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昭示我们，这场巨变尚不可言其结束。整个这段历史中，各种思潮纷然杂陈，光怪陆离。然而思潮并非思想。思潮往往是诸人群之趋向未必准确、未必恰当的一种表现方式。思潮倏忽更迭，配得上称为思想的却遭冷落。这种情况或许出于社会的注意力集中于急务。关于近代起于何时的划界可以作为例证。虽然大家都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中西文化相互作用过程，却不取明朝采纳西历、而取1840年英国炮舰进攻广州为“近代”起点。须知历法向来是中国社会头等大事之一，有时是用以象征政权的！历史分期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对时代本质的感受。在分期基准上，炮舰比历法得到了更重要的关注，证明国

人以“急务为先”作为第一准则。急务为先则思想退后，时间长了，连思想也专注于急务，忘记了自己的根本——求道。大道迷失，后果是对急务争执不已，心气浮躁，冲突愈演愈烈……

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思想理论的作用。现在需要的是阐明大道的思想。阐明不可能凭空出现，思想的事业总要有所依托。前人的思想对我们总有参考作用，因此需要了解前人的思想。读他们的书是途径之一。为了满足读者当下的需求，有必要从书海中检选出一些思想家的论道之作。

关于近代与现代的划分有很多说法，考虑到在两个最大的问题上，一个是中国社会正在进入现代世界，另一个是在上述过程中中国社会内部同时进行着中、西文化激烈的相互作用，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根本不同，所以这两个时期的作品都考虑收录。这段历史事件繁多，人物大量涌现、更迭，思想引出思潮、思潮远离思想，纷繁迷乱，检阅、审理甚为不易。何为“论道之作”？体用不二、道器无间，论器者常常即是论道。强分之，必有毛病。不分，又难免堕入停留于实际急务之窠臼。检选关乎哲学者较为近之。何为“思想家”？或许是最有争议之处。一则思想与思潮不易区分，再则鉴定谁为思想家须高于这些思想代表人物，不用说我们远远不及，历史也尚未进展到足以作出决断的时候。入选的个别作者或许只能算个思潮代表人物，他能否归入思想家之列，只好由读者和历史判定。好在现在并非要对人物作出历史结论，目前的需要只是从前人的书本中引发出我们现在对大道的追寻。这套丛书仅为提供材料而选，其本身不是为了争论，因此尽量不囿入我们自己的倾向，各派思想凡有代表性且深思及大道的，一律平等对待，使其有一席之地。我们相信经过多年反复考验的读者自有鉴别能力。

在这个时代，我们优于前人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半世纪的正

反历史经验，可以用来对照各种思想，思考其是非。这是我们的前人在写下他们的著作时所没有的。如果有了这样优越的条件还不能超过前代思想家，我们在历史面前真是应该感到万分的惭愧。中华民族已充分觉醒，国力正在迅速崛起。深思的时代正在来临。我们愿借此丛书与全民族同思大道。

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四年九月

编 选 者 序

俞吾金

记得有一位西方哲人曾经说过,天平从来就不是平的,以这样的观点诉诸历史,历史自然成了一幅被扭曲的漫画。诚然,我们也不否认,历史在某些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千古之谜,也留下了难以昭雪的沉冤,然而,平心而论,历史的天平大致上还是平的。如果说,时势可以造英雄的话,那末,历史永远只对那些真正的英雄敞开自己的怀抱。一方面,历史不允许人们把庸常之辈升格为英雄;另一方面,历史也不会长久地容忍人们把一个杰出的人物贬为常人。我们也许可以说,胡适在历史上的遭遇正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种种情感因素的淡化,当人们返观五四前后以来的中国现代史时,不得不承认,胡适乃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尽管胡适像任何其他的杰出人物一样,受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尤其表现在他的某些近乎天真的政治见解上,然而,通观他的各种见解,研读他所留下的、充满原创性的各种论著,我们由衷地承认,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大师。

胡适出生于安徽绩溪,从小受当地治学传统的影响,研读古籍甚勤,因而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青年时期又留学美国,得到了西学方面的严格训练,尤其是杜威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对胡适一生的治学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有这两方面精深造诣

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胡适自己在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也写道：

现今的中国学术界正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1〕}

谁知不久以后，王国维又自沉于昆明湖。于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开拓工作愈来愈多地落到胡适一辈的身上。胡适在治学上的运气还在于，他回国后任教于当时的文化中心北京大学，和北大、清华的一些杰出学者，如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冯友兰、沈尹默、梁漱溟、梁启超、李大钊、陈寅恪等相互砥砺切磋，从而使他在思想学术上一直处于制高点上。从早年因提出文学改良的口号和倡导白话文运动而赢得大名，到晚年在《水经注》考证中取得卓越成绩，胡适的诸多创发性的思想和论著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纵观胡适的一生，他治学的范围十分宽泛，涉及到哲学、文学、历史、宗教、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上，他撰写了第一部哲学史、文学史、逻辑史、禅宗史，编写了第一本白话诗集、第一本白话文喜剧。他还创立了新红学，对《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醒世姻缘传》等小说的考证也卓然成一家之言。他的论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井田辨”、“说儒”等显示了他在哲学和史学研究中的深厚学养和大胆创新。一言以蔽之，胡适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巨大的，胡适的论著所蕴涵的启蒙和解放的热情不仅已影响了几代人（包括毛泽东），而且也将对未来的世代产生深远的影响。

〔1〕《胡适的日记》（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0页。

毋庸讳言,在这篇短序里,要对胡适各方面的思想作出详尽的评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力图把握并揭示出胡适治学的基本精神,读者一旦掌握了这一基本精神,也就获得了一把理解胡适全部论著的钥匙。那么,胡适治学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从中国清代学者和西方赫胥黎、杜威等人身上汲取过来的“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的精神。然而,胡适的怀疑和批判并不停留在单纯否定的阴影中,只要有一定的理据,他就敢于提出大胆的假设(如《红楼梦》考证、《醒世姻缘传》考证、禅宗史考证等),并小心地进行证实;如无充分的资料或理据,则主张对问题取“暂缓判断”的态度(如《老子》年代考证)。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或许可把胡适治学的基本精神概括为疑古与开新。

这一基本精神又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以问题为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著名的论文中,胡适主张: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

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

是思想的第一步功夫。^{〔1〕}

在胡适看来,研究社会问题是如此,治学也是如此。王云五先生读书甚博,但苦于无系统。胡适对他说:

有一个研究问题作中心,则一切学问、一切材料都有所附丽。^{〔2〕}

从某种意义上讲,胡适所有的论著,尤其是他的考证方面的论著都是以问题为起点的。用这样的眼光去读解胡适的著作,我们看到的正是胡适提出的各种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

〔1〕《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

〔2〕《胡适的日记》(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8页。

第二种方法是把科学的严格性和艺术的想象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胡适在谈到历史研究时,这样写道:

做历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大胆的想象力。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有时史料虽可靠,而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这时候必须靠史家的想象来解释。整理史料固重要,解释(interpret)史料也极为重要。〔1〕

在胡适看来,中国史学研究的缺点就是注重史料堆积而忽视对史料的理解,尤其是对史料内含的意义的阐发,这就不容易在研究中打开新局面。而胡适之所以能在对史学资料的考证方面提出许多创造性的新见解,正在于他在科学地、严格地梳理资料时,敢于发挥艺术的想象力的作用。比如,胡适对《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颇感怀疑,他在反复读解这篇小说的基础上,发现它和《聊斋志异》中的《江城》篇在结构和情节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于是作出大胆的和推测:《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也许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也许是他的朋友〔2〕。这个大胆的形象被后来发现的一系列新的资料所证实。当然,胡适所说的大胆的想象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这种想象一要合乎理据,二要在小心的求证中得到证实,在未证实之前,它始终只是一个假设。

第三种方法是把“大刀阔斧”和“拿绣花针”结合起来。胡适在1922年2月26日的日记中提到他刚出版的《章实斋年谱》时,十分感慨地写道:

我费了半年的闲空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

〔1〕《胡适的日记》(上),第185页。

〔2〕参阅杨犁编《胡适文粹》,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

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劈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起绣花针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它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1〕}

显然，胡适在这里说的“大刀阔斧”是指对大问题，如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拿绣花针”则是对某个历史人物，尤其是其年谱的研究。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后一方面的工作是更难做的，它不但要耗费研究者大量的时间，而且要求整个研究过程必须十分细致。年谱要求把一个历史人物的一生（数十年时间）的活动和思想尽可能详尽地描述出来，稍有疏漏，很容易为后人证伪，这也正是年谱类著作的难写之处。在中国的学人中，有一部分人是专拿绣花针的，更大一部分人则是专拿斧头的，然而，能同时拿斧头和绣花针的人却寥若晨星。然而，专拿斧头去砍的学者必然会由于忽略对史料准确性的严格把握而把自己的理论构架奠基于沙滩之上，从而很容易为同时代的人和后人所推翻（如梁漱溟先生的“文化三路向”说）；反之，专拿绣花针的学者又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窘境，不能从全局的高度上来理解并把握史料（如清代考据派学者），由此足见胡适主张把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的重要意义。

第四种方法是把社会学方法和人类学方法结合起来导入对史料的考证之中。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许多典籍，尤其是文学作品都被历代意识形态所“酸化”，这需要用人类学的眼光进行复原，如楚辞中不少描写自然景色的诗句都被曲解为忠臣意识的表现；历史地、自然地发展并形成起来的《水浒传》、《西游记》

〔1〕《胡适的日记》（上），第273页。

等作品也被罩上各种儒、释、道的神秘的光晕，从而失去了其本来面目；许多人还把《聊斋志异》中的鬼狐故事附会为蒲松龄对时人的讥刺，而胡适的人类学研究则表明，相信鬼狐乃是当时人的一种时尚，蒲松龄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却是一个平庸的思想家，他自己也深信鬼狐的存在，深信因果报应乃是人类社会的一条永恒的律令。

胡适不仅主张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来恢复古代文本的真实价值，而且主张进一步从社会学研究的高度揭示文本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他对李汝珍的《镜花缘》的分析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当人们把各种穿凿的见解加诸《镜花缘》时，胡适却指出，《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

我的答案是：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妇女问题。

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1〕}

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胡适指出，书中的女儿国是李汝珍的乌托邦，并预言，描写女儿国的这段文字将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远不朽的大文。在胡适看来，在国故整理和文化史研究中要打开新的天地，就要善于把人类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对史料的意义作出新的诠释。

胡适治学的基本精神和方法对于缺乏科学传统和精神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胡适在各方面研究中所取得的卓越的成就也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来分析，我们也能看出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的偏失之处：

首先，胡适重视研究方法是对的，但他把这一点推向极端却

〔1〕《胡适文存》卷四，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第138页。

是错误的。他在自述中说：

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1〕

胡适的方法崇拜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即把哲学和方法论等同起来，从而忽略了对方法论的根基——本体论的思考和研究，这也正是他和熊十力、金岳霖等人的差异之处。比如，胡适把五四运动理解为是对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政治干扰”，这表明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及其演化方向缺乏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他虽然也在高喊“民主”、“自由”的口号，而他自己则一直在考据学的旧靴子中打转，正如唐德刚先生所批评的：

正当杜威之学走向一个新阶段之时，他的东方第一大弟子胡适却大开其倒车——到处宣传其早已与时代脱了节的，停滞在“训诂”、“校勘”阶段的“治学方法”：他自己虽然是满口“自由、民主”，而每日灯下埋头钻研的却是一部支离破碎的《水经注》！天下事之“不调和”有若斯者乎？〔2〕

这种怪现象正导源于胡适对方法的片面倚重。

其次，胡适提倡怀疑的、批判的研究精神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他的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却是不彻底的。胡适主张用怀疑的态度去读解各种文本，了解各种思潮，不要轻易给别人牵了鼻子走，可他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却一味盲从，不但自己被它牵着走，而且给小儿子取名“思杜”，似乎很愿意他的儿子也被杜威的思想一起牵走。唐德刚先生批评胡适说：

他老人家治学，对任何学派都“不疑处有疑”；何以唯独对

〔1〕《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

〔2〕《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146页。

杜威“有疑处不疑”，还要叫自己的小儿子“思杜”（思念杜威），一代接着一代的“思”下去呢？〔1〕

难道胡适忘记了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古训了吗？由于胡适对杜威的实验主义缺乏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这就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开拓不出更大的、新的空间来。

最后，胡适主张任何研究工作都要从具体问题入手，固然有其积极的方面，但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即忽略了对具体问题背面的总体背景的研究和把握。如胡适在《研究社会问题底方法》一文中谈到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具体问题，即纳妾、娼妓等，但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质和发展方向不置一词，其实，总体性的问题不解决，又如何去解决具体问题呢？胡适把问题（具体问题）与主义（总体问题）对立起来，也表明他是一个目光并不远大的经验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这种陷于支离破碎的研究方法也极大地束缚了胡适在社会和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创造性。

当然，我们今天研究胡适，也决不能用今人思考的高度去要求他，我们应当对胡适的功过得失作出合情合理的评价。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文选的篇幅是限定的，而胡适一生的论著在数量上是十分可观的，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一方面我们割舍了胡适的某些并非不重要的论著；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节选的办法，尽可能压缩胡适某些主要论著的篇幅，以便尽可能多地选入胡适在各个领域研究中富有原创性的代表作，并兼顾胡适在各种思想学术争论中的基本见解。然而，我们在这里的选择仍然难免有偏失之处，只有俟通人明教了。

1994年9月20日

〔1〕《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1933年版，第126页。

目 录

编选者序	俞吾金
------------	-----

文学·文艺·文化

文学改良刍议	3
论短篇小说	14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26
论国故学	
——答毛子水	38
谈新诗	
——八年来一件大事	40
研究国故的方法	58
《章实斋年谱》自序	62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66
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80
谈谈《诗经》	97
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106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111
传记文学	115
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129

日记选录·····	142
哲学·历史·宗教	
先秦诸子进化论·····	149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节选)·····	169
问题与主义·····	199
新思潮的意义·····	231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240
不朽	
——我的宗教·····	250
先秦名学史(节选)·····	259
记李觏的学说	
——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	269
《科学与人生观》序·····	286
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	304
人权论集序·····	309
史马迁替商人辩护·····	310
说儒·····	316
自由主义·····	385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	392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	404
历史科学的方法·····	421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424
日记选录·····	452
考证·辨伪·存疑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457
井田辨·····	464
《红楼梦》考证·····	487

论墨学·····	562
读《楚辞》·····	571
《西游记》考证(节选)·····	577
《镜花缘》的引论(节选)·····	586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604
《醒世姻缘传》考证(节选)·····	613
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	632
《水经注》考·····	653